

## 第七章

### 走向新的生活

抗日戰爭圖書館  
www.krzzjh.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h.com

## 一 去 解 放 区

离开长春，我同 一批放下武器的兵团司令部及新 7 军军官，动身去哈尔滨解放区，途中在永吉做了短暂停留。

在永吉，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名字记忆不清了）热情地款待了我们，特地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我和杨友梅等人，还送给我们一些生活零用钱。交谈起来才知道，这位省政府主席是我老家石门的邻县慈利人。也许是同乡的缘故，他给我留下了颇为亲切的印象。

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到达哈尔滨，有解放军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负责官员前来迎接。随后被安置住在解放军政治部联络部招待所。一段时间以后，又搬到市区一栋小楼去住。这栋楼房原来的主人是一个白俄商人，室内设施齐全，我与杨友梅住在楼下，李鸿夫妇、史说、龙国钧等人住在楼上。

在哈尔滨一直住了三个月。解放军对我们的生活十分优待，行动也很自由，可最初我的心情仍然非常苦闷。在我二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与新旧反动军阀血战过，与日本侵略者血战过，最后竟败在共产党的手下，对这个现实思想上一时很难接受。尤其是看到为之奋斗了近半生的“党国”事业，已经穷途末路，回天乏术，我心中更感到空

虚和痛苦。绝望之余，只有用封建的正统思想来约束自己，努力保持所谓军人的“气节”，不肯做任何有损“党国”的事情。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放弃愚忠于国民党政权的打算。

那一时期，中共党内何长工等同志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参加人民政权的工作，共同为人民服务。我由于思想上的顽固，都拒绝了，表示只想当老百姓，不愿再过问政治。不过，我还是应邀参加了一些参观解放区的活动，希望亲身体会、了解一下解放区的实际情况。

我到哈尔滨不久，东北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长春解放后，蒋介石先生飞到北平，亲自指挥廖耀湘将军的第9兵团向辽西方向撤退，但10月底即在辽西黑山、大虎山地区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全军覆没，廖氏本人及部下官兵八万余人被俘。11月初沈阳、营口相继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曾几何时，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开出关外，企图抢占整个东北，仅仅过了三年时间，便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可见历史规律和革命进程的发展，对于一个腐朽、没落的反动政权来说是多么无情。

通过报纸，我每天都看到外面的变化。起初拿起报，看两下就觉得心烦，渐渐地心境比较平静些，看得仔细一点了。

面对解放战争如此巨大、迅速的发展，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原是当事人之一，这些都是在意料之中的。我倒愈来愈注意报纸上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方面的消息。共产党有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胜利，这一点

我不再怀疑，但这个党能不能治理好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贫穷落后的大国，对此我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现在看报上的消息，除了军事以外，也有关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报道，此外还有一些讲解、宣传共产党经济、文化政策的文章，读起来觉得颇有道理，而且我在解放区参观所看到的事实，也证明即使在战火熊熊的情况下，共产党还在认真地领导着各项建设事业。

这个时候，我的认识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老实说，尽管表面上还想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已顾而不固了。

本来，住在哈尔滨，我除了看报之外，什么书都不想读，也读不进去。看报看了个把月之后，心境好一些了，对于看报的兴趣愈来愈浓了，当初心里存在着的问题——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了？——似乎得到一些初步的解答。可是初步的解答愈多，问题也愈多，问题中有许多是不能从报上得到满意的解答的。于是看书的愿望油然而生。我要求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得到一部当初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这部书我至今还保存着，成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纪念品。

打开《毛泽东选集》，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从不知道毛主席有这样大的学问。他在书中对当时局势的分析，特别是谈到国民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失败的原因，以及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结束内战的愿望，对我深有触动和启发。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过去我是不清楚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从亲身的体验中，我早知道共产党得

到民心，能够组织老百姓，老百姓愿意跟他们走。打起仗来，解放军士气高涨、指挥灵活等等。

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成功，是经过无数艰难困苦得来的。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十年内战，共产党紧紧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建立和发展了革命武装。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党的领导地位，才使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可靠的保证。毛主席的伟大贡献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时，我特别喜欢读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通过这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我才知道，毛主席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战略方针，毛主席又创造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方式。根据这些天才卓绝的方针和方式，毛主席指导了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的人民军队，一次接着一次地战胜敌人。

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我又阅读了《列宁文选》、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和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著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开始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时我看书的兴趣特别浓厚，读了一本又一本。通过阅读革命书籍和观察实际，我逐步建立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敬重和信仰。

我在哈尔滨潜心读书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接连取得伟大胜利。1948年11月初，第2、第3两大野战军联

合发动了彻底决定国民党政权覆灭命运的淮海战役，经过前后六十五天的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余万，我过去的挚友杜聿明将军也在这次战役中兵败被俘。同年12月初，第4野战军和华北解放军两个兵团发动平津战役，攻克张家口和天津，和平解放了古都北平。

读书的心得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自然不断影响着我的思想，但头脑中的封建毒素和旧意识却也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那时我还不肯放弃只当老百姓的打算，不愿意亲身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军方面先后让我写自传，给杜聿明将军写信等，都被我推辞了。可见一个人要战胜自己的消极思想，走向进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1949年1月底，我从哈尔滨移居抚顺，受到和在哈尔滨一样的款待。在抚顺的时候，我的生活圈子扩大了，常去看戏，和一些熟人来往。当时，许多在战场上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集中到抚顺，其中有我的老部下廖耀湘、郑庭笈等人，我可以经常看望他们。

过了不久，和我一起从哈尔滨来到抚顺的原第1兵团及新7军投诚军官们，开始分批遣散，不少人还分配了工作，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被委派去部队军事院校担任高级教官，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落后了，心中十分惆怅。6月间，我的夫人陈碧莲从上海来到抚顺。自1948年3月我去长春后，我们夫妻还是第一次见面，一时真是百感交集。政府对我们很关照，特地另外分配了一处住宅供我们居住。

我在抚顺前后居住了一年半时间。这期间，我有充分

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当时我读书简直上了瘾，一本接一本地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愈读愈觉得心里亮堂，对许多问题的体会也比较深切了，心境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冷静地思索起自己二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二十多年前，我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团结合作，造就出朝气蓬勃的革命形势。我先后参加过东征战役和北伐战争，曾亲身体验到部队内部上下一心，确实有那么一种人人不怕死、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而且处处得到工农民众的拥护和支援，所以革命军队所向无敌，到处打胜仗。

在北伐的过程中，情况变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从打倒列强转而依靠英美势力，以谋取自己的统治地位。对这些变化我当时并不清楚。只是感觉到，北伐军渐渐开始腐化了。军队一进城，军官就去嫖赌，丢下部队不管。部队内部纪律涣散，欺压百姓的事时有发生，军民关系不再像以往那般亲密了。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军队腐化的程度也步步加深。我不知道军队腐化实际上是军队性质蜕变的象征。

1927年国共分裂，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极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一生政治道路选择上的一个极重要的关键。但在这个关键上我犯了错误。尽管当时我对国民党右派大肆“清共”无法理解，甚至感到痛心；对于一些曾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们惨遭杀害和迫害，内心里非常同情和惋惜。但我始终视国民党为“正统”，认为国民革命只有通过孙中



山先生遗下的国民党来完成，因而没有意识到当时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便是离开了革命，走上一条与自己初衷相反的政治道路。

在国民党的营垒里，我的道路愈走愈窄，心情也愈来愈痛苦。一方面我意识到这个党正在腐化、堕落，完全背弃了人民。这一点我在抗战胜利后体会最深。接收上海时，国民党大小官员大肆侵吞日伪时期留下的资产，简直是一帮无法无天的匪徒，穷凶极恶，什么都抢，前门贴封条，后门搬物资，坐地分赃，不少人发了大财，却无人理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沦陷区人民。那时上海物价一日数变，商人囤积居奇，地痞流氓横行不法，小偷扒手多如牛毛，无所谓社会秩序，谈不到生活保障，老百姓终日惶惶，很快失去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以后“接收”东北时也是这样，许多国民党党政军官员视去东北为“肥缺”，敲诈勒索，贪污中饱，几乎无所不为，弄得国民党占领区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东北老百姓把国民党中央军称之为“遭殃军”。当时我对此确实感到痛心疾首。但是，另一方面，我在长期反动、封建思想毒害下已无力自拔。尽管后来我在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方面，对国民党政权已经绝望，却始终未曾想过要同它彻底决裂，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相反，我一直以所谓“党国”“忠臣”自居，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其苦撑，甘愿做这个早已腐朽了的政权的殉葬品。当初奉调去东北，以及后来受命去困守长春，无不是在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下行动的。

长期以来，在我的头脑中，既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希

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但又有封建的愚忠意识。去东北以后，特别是困守长春期间，这两种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我在精神上为此备受痛苦的煎熬。长春的解放使我自己也得到了解放，从此与曾经走过的漫长的错误道路告别了，精神上得到解脱，政治上获得新生。放下武器以后，在接触的人物中，谁也不曾追究过我历史上的任何一页，也从未强迫我做当时尚不愿做的任何事情。由此我深深体会到肖劲光将军对我说过的“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句话的亲切意味，才真正认识、理解到共产党政策的伟大。

通过在哈尔滨、抚顺期间的认真学习和自我思想斗争，给予我很大的精神力量，使我能以今日之我否定旧日之我并催生未来之我。我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并没有完结，而且正在重新开始，思想也渐渐开朗起来。

## 二 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继续胜利发展。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企图凭藉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前进，与中共划江而治。为了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4月20日子夜，解放军百万雄师发动渡江战役，仅经两昼夜战斗，便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第三天解放了南京。大军续进，乘胜攻击聚集在淞沪地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5月27日，我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亦告解放。

先是，长春解放时，国民党的报刊登载了我已“壮烈成仁”的报道。我在上海的家人不知究竟，曾四出打探确实消息，后来，原在我司令部工作的投诚军官从东北遣送回家到上海，才明白真相。上海解放后，我写信回家，从此和家中有了联系。

解放战争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使我精神上得到大人的鼓舞。那时特别对我思想有影响的是：按历史地位来说是我的前辈的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员如张治中、邵力子、程潜等，毅然脱离国民党政权，投向人民怀抱；我的黄埔军校同期同学，曾一起参加东北内战的好友陈明仁等也在长沙勇敢起义。我在这些人的行动里得到了鼓舞与

支援，得到了共鸣和启发，切实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确早已穷途末路，所以众叛亲离；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该以鲜明的行动，争取立功自赎。这些前辈和同学所采取的大义行动，甚至有些是超过我的估计的，这正证明了自己一个时期以来的思想变化是正确的，并且需要更快的进步。

在抚顺，我一直住到1950年8月，后因身体不适前往上海就医。离开抚顺，我先到沈阳。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会见了，并请我吃饭、看戏，非常客气。在沈阳仅停留一日，第二天即乘火车前往北京，沈阳军区政治部特派了一位科长陪送。

到了北京，我先去看望了我的好友、后来成为我的亲家的焦实斋先生。焦氏与我有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东北内战初期，他曾一度担任国民党东北长官部总顾问，以后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而弃官回到北平，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出任国民党“华北总部”副秘书长（实际上主持秘书长事务），积极推动、协助傅作义将军与解放军和谈，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过贡献。此次老友重逢，彼此都十分欢愉。焦夫人金一清女士十分热情，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款待我，不过当时我胃病严重，食欲很差。然而席间焦先生向我介绍解放以来国家出现的种种令人振奋的新气象，以及他本人对新中国建设光辉前景的展望，都强烈地感染、打动了我的心。从这位老朋友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榜样。

过了两天，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军又请我去全聚德吃烤鸭。一见面，我首先就上次见面时的生硬态度表示了歉

意，两位将军亲切地表示理解我当时的心境，席间大家谈古说今，十分快活。后来话题转到国家建设问题，两位将军希望我参加解放台湾的工作。当时尽管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但尚未完全摆脱旧的封建意识束缚，故犹豫半天方道出心中难言之隐。我表示通过学习，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本质，完全拥护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决策，但碍于海峡彼岸多是往日故旧朋友，彼此有着多年交谊，自己不愿与他们兵戎相见。两位将军闻言客气地说，他们希望我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完全尊重我个人的意愿，绝无勉强之意。共产党人这种恢宏大度的胸襟，使我非常感动和钦敬，多年后，我与两位肖将军还保持着朋友般的友谊，可惜他们均已谢世了。1989年冬肖劲光将军重病时，我曾特地前往解放军陆军总医院看望他，晤谈甚欢，不料那次相见竟成永诀，令人痛惜。

在北京期间，我还荣幸地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感到意外的兴奋，想不到事隔多年之后，周恩来总理还一直记挂和关怀着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同时也想起了两年前一件令人感动的往事：1948年10月18日，我在长春山穷水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了将我从黑暗中挽救出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写信给我，分析形势，晓以大义，劝我顾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举行反蒋起义，回到人民的行列中。信件原文如下：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

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十月十八日

据说这封充满黄埔师生情谊的信件是用电报转达到前线的。次日上午，解放军进驻长春时，交给了新7军副军长史说，请他转交给我。可惜因当时我的兵团司令部附近枪声四起，市内秩序混乱，史说派去的人未能把信送到，我到解放区后方知此事。不过对于周总理的这番亲切关怀，我是始终未能忘怀的。

那天，我准时来到周总理家中。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另一位老师聂荣臻元帅也已在座。见我走进会客室，周总理连忙起身，快步迎了过来，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紧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我们很久未见面了，难得有这个机会呀……。”

我被周总理的坦城、热情所感动，觉得他还像当年的周主任那样诚挚可亲。一时真是百感交集，两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半天才愧疚地说出几句话：“周总理，几十年来，我忘了老师的教诲，长春解放前夕，您还亲自写信给我，我感谢您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

周总理摆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你不是过来了吗？今后咱们都要为人民做点事嘛！”

大家落座之后，周总理问我在北京是否还有熟人，我说有位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叫李奇中，与我交谊甚笃，据说他现在北京。周总理说这个人我知道， he 现在是政务院参事。随即吩咐工作人员快去请来。过了不久，李奇中便赶到了，师生四人相见，分外亲热。

吃饭的时候，周总理详尽地询问起我的身体和家庭情况，那副关切的神情犹如家人一般，使我如沐春风，心底感到无比的温暖。周总理还和蔼地问我今后有何具体打算，我想了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别无所长，人也老了，打算回家乡种地去。李奇中在旁插话道：“好哇，你在老师面前还敢称老？”说得一桌人都笑起来，周总理亲切地说：“洞国，你还不到五十岁嘛，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多为人民做

贡献。现在国家建设刚刚开始，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呀。”周总理的诚恳态度使我非常感动，遂表示拟先回上海治治病，料理一下家务，再听候安排。周总理说：“你先回家休息一下也好，身体养好后随时可以来。”

席间，周总理还询问起当年中国驻印军在缅北与盟军联合作战的情形。那时正值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军的作战特点，指出美国人打仗主要靠武器装备，打不了硬仗，为此还特别举了几个实际战例加以说明。周总理和聂帅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询问，待我讲到美军非常依赖空中补给，如过去中美军队共同执行作战任务时，美国兵行军走累了，就先丢弃武器弹药，然后再丢弃衣服，待到达目的地时，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了，以致空运的装备只好先全部补充给美军，周总理听得有趣，不禁开怀笑了起来。据说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周总理多次引用我讲的这几件事，激励大家要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克服某些人头脑中的崇美、恐美思想，坚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心。

8月中旬，我由北京到了上海，回到原来住的房子。这房子是公家的，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有收回，仍让我的家眷居住。到了上海，我就进公济医院去公费医疗。

我的身体不好，主要是胃病，总觉得胃里有东西顶着撑着，时感疼痛。这病自去长春加重了。那时精神苦闷，心力交瘁，反应到胃。没有想到，一个战败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竟能在人民政府关照下进行公费治疗。长春之战中，我却使人民受了多少苦难。



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回家去休养。这一休养，在上海一直住到1952年6月。在这段休养期间，我有机会和解放后的新社会发生接触，有机会把学到的、并初步信仰的理论和现实印证。

上海，本是很熟悉的地方，抗战胜利后，我在这里住了半年多。解放前，这里是有名的花花世界、冒险家的乐园。谁知解放刚刚一两年，上海居然大变了样：昔日常见的那些恶霸、流氓、娼妓等等几乎涤荡殆尽，整个城市在人民政府管理下井然有序、生机勃勃，人民安居乐业。我原来认为上海的情况复杂，牵连非常广泛，很难治理好，而共产党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在事实面前，我真是叹服了。

等我住得久一些，其间经过历次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上海的情况愈发好转。这个被列强盘踞百年以上，被官僚买办作为大本营、奴役中国人民的作恶渊藪，逐步改变了性质，成为我国新型的经济、文化大都市，广大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根深蒂固的旧社会风气也彻底扭转了，上海的确新生了。

理论和现实印证，使我愈来愈坚定地确信，自己新的政治信仰没有错。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和实际措施是一致的，是贯彻到底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前途一定会大有希望。

1951年冬，我写信给李奇中，谈到自己目睹祖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心情格外振奋，准备春节期间再到北京看看。李氏将此事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很快给我打来

电报，邀我去京。

春节前夕，我到了北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政务院再次会见并宴请了我。一见面，周总理还是那么亲切地关怀备至，问长问短。我心情很激动，坦诚地向周总理汇报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听了我的汇报，周总理格外高兴地说：“你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步，这是值得庆贺的，我代表大家欢迎你。你的年纪还轻些，完全可以多为人民服务嘛。”

我恳切地向周总理表示：“感谢总理的关怀，我把上海家中的事情安置好，很快来京工作，听候总理安排。”

周总理爽朗地笑了起来，说：“好，好，你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嘛。”

春节过后，我赶回上海安排家务。大约5月中下旬，我再次给周总理打了一个电报，表示一切准备妥当，随时听候总理安排。承蒙他很快复电，要我尽快去京。

1952年6月，我举家迁往北京，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这是我第一次和人民政府的实际工作发生关系。看到新中国成立仅仅几年，水利建设工程规模之大、收效之宏，就已举世瞩目，心中格外振奋，感到共产党确实是一心一意造福于人民的，决心竭尽自己的全力，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我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机要工作。

过了不久，我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家中宴请我。当时我的心情既激动又不安，毛主席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这该是多么荣幸的事情呀！但是，想到自己曾负罪于人民，参加工作以来尚未给国家做出什么贡献，却身受种种优厚的待遇，现在又蒙毛主席亲自接见，心中甚觉愧疚。见了毛主席，我该说些什么呢？

去见毛主席那一天，我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还有鹿钟麟将军等早已在座。我刚到，毛主席即迎了过来，同我握手、寒暄、让座。

我本来真有些紧张、拘谨，然而毛主席开始一句话一个动作就打消了我的顾虑。坐定之后，他问我吸不吸烟。我应声说“吸”，顺手在茶几上取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主席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身替我点燃了香烟。这位深受亿万人民敬仰和拥戴的革命领袖，竟是如此亲切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有旧社会达官贵人那种虚伪矫饰、盛气凌人的样子，使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轻松多了。

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起我全家的生活情况。我如实答道，由于感情上的原因，妻子刚刚同我离异，儿子还未结婚，已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现在沈阳的一家建筑部门工作。毛主席听后说：家庭问题很重要，要妥善处理好。人对生活要有一种达观的态度，不能为一时的波折而灰心。只要进取向上，是不难重新获得个人幸福的。我听了毛主席这些体贴入微的话，感动得不禁连连点头。接

着他又笑着说：“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还得多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五十一岁，还很年轻哟！”我很惊讶，想不到毛主席这么了解我，连我的年龄都知道，激动地表示今后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们愈谈愈随便，不知怎地，我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么一个不甚得体的问题：“您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毛主席似乎也感到我问得太突然，怔了怔，望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毛主席爽朗地笑了，然后回答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真正转变过来嘛！……”

毛主席又加重语气说，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在那天的宴席上，毛主席讲了好些。许多话记不起来了，但我始终难忘的是，毛主席以其切身的体会开导我，鼓励我转变立场，为人民服务，走革命之路。

从那以后，我一直牢记着毛主席的谆谆教诲，认真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走上了一条爱国和革命的道路。

三十多年的时光逝去了，尽管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不少曲折，但祖国毕竟还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准迅速改善，国家的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旧中国那种任人欺凌宰割的屈辱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实践表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也是我在人生道路上探索多年而认识到的真理。

由于人民的关怀和信任，我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参加民主党派工作后，于1979年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还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副会长。多年来，我一直以新中国建设者的身份，积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如今我已到耄耋之年，回首往事，我非常庆幸自己的后半生走上了一条正确的生活道路。展望未来，我坚信社会主义事业是光明和大有前途的，决心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底。